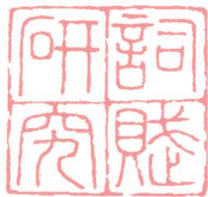


宋人赋论及作品散论

● 何玉兰 著 ●



巴蜀書社

宋人赋论 及作品散论

何玉兰 著

巴蜀书社

中国·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人赋论及作品散论 / 何玉兰著. — 成都: 巴蜀书社,
2002.1

ISBN 7-80659-313-6

I. 宋... II. 何... III. 赋—文学研究—中国—宋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6677 号

责任编辑: 周田青

封面设计: 李文金

宋人赋论及作品散论

何玉兰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 (028) 6656816

发行科电话 (028) 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125

字数 190 千

2002 年 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100 册

ISBN 7-80659-313-6/I·123

定价: 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电话: 5011398

前 言

辞赋研究的勃兴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经过二十余年学术界专家学者的努力，对于汉代、魏晋南北朝的辞赋研究，成果丰硕，挖掘较深，出现了多部专著及大量的学术论文。然而对于唐宋及以后的辞赋研究尚缺少足够的关注和较为深入的研究。

宋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继汉唐之后又一个在文学上全面丰收的时期。宋代的诗、文、词都自有特色，自成风貌。辞赋也不例外。在宋代，宋人将中唐以来赋的散文化倾向定型为“文赋”，可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宋代文赋评价都较低，简单斥之为“一片押韵之文”，认为“文赋尚理而失于辞，故读之者无咏歌之遗音，不可言丽矣”。但如果平心而论，宋人文赋并非赋体文学中的怪胎，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对前代辞赋传统承传的溯源性。赋虽以铺陈状物为主，但从赋一产生何尝又绝对排斥散文化因素？“古赋”与“文赋”之间何尝是截然相对？

律赋，由于是科举制度的产物，故其价值长期淹而不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人基本上对律赋不屑以顾。可如果实事求是而论，律赋经唐及宋，文人除了应试和为应试而作的习作外，有

时也用在其他情况，或寓物言志，或写景抒情，又何尝毫无好作品？而且在宋人笔下还试图用古赋和散文笔法解放律赋之体，其努力的轨迹亦有迹可寻。

宋代文人较之汉唐，他们深思好学，务实求真，更富于思辨理性，更富于知识综合。他们不独于文学的创作实践富于创新，不愿步前人后辙，于文学理论亦多有创见，出现了大量以“诗话体”、“笔记体”论文的新形式。宋人的辞赋理论虽乏专书，但散见于诗话、杂录、文论中的原始材料，却相当丰富，只是至今尚未有系统的整理和探讨，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空白和缺陷。

对此，笔者不揣知识浅薄，结合宋人的辞赋创作实践，对宋人的赋论赋话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探讨，对宋代的律赋、文赋的基本特征作了一些专题阐述，以期填补宋代辞赋研究领域的空白提供一些参考。对“宋代辞赋史”方面的研究已有马积高的《赋史》、郭维森、许结的《中国辞赋史》等专著论及之，故笔者拙著不追求“史”的系统性，而意在突破一些重大问题。是否达此目的，敬请学术界专家学者指正。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宋代文化环境与宋代辞赋·····	(1)
第一节 宋代的文化政策·····	(1)
第二节 宋代特殊的社会矛盾·····	(5)
第三节 宋人特殊的文化心态·····	(7)
第四节 宋赋基本特征·····	(9)
第二章 宋人赋论赋话扫描·····	(16)
第一节 直承古赋、楚辞抒情传统·····	(18)
第二节 提倡平易自然的赋体风格·····	(23)
第三节 以赋为学·····	(26)
第三章 宋赋平易风格理论举隅·····	(33)
第一节 “以水喻文”观探因·····	(33)
一 北宋三家“以水喻文”观综述·····	(34)
二 “以水喻文”观原因探讨·····	(40)
第二节 苏轼“辞达说”的创造性·····	(49)
一 苏轼“辞达说”简介·····	(49)

二 苏轼“辞达说”提出的背景	(51)
三 苏轼“辞达说”的创造性	(54)
第四章 宋赋对前代辞赋传统的承传	(58)
第一节 宋赋与汉赋的杂文因素	(58)
一 问题的提出	(58)
二 汉赋杂文因素探源	(59)
三 从刘氏所论,观汉赋的杂文因素	(61)
四 汉赋杂文因素的价值	(62)
五 汉赋杂文因素对宋赋的影响	(68)
第二节 宋赋的抒情性与魏晋南北朝赋	(73)
一 魏晋南北朝赋家的“以情纬文”	(74)
二 宋赋抒情性的变异及原因	(82)
第三节 南宋“咏史赋”对晚唐“咏史赋”的承传	(88)
一 晚唐、南宋“咏史赋”特征	(88)
二 南宋“咏史赋”的特征及其原因	(101)
第五章 “美文”与“善意”——宋人眼中的律赋	(107)
第一节 宋代律赋产生的背景	(108)
第二节 代表性观点评述	(112)
第三节 两宋律赋的特色	(120)
第六章 重要赋家、作品论	(130)
第一节 诤臣之赋却平易——田锡赋刍议	(130)
一 田锡生平及文学思想	(130)
二 田锡赋作评析	(136)
三 田锡赋的价值	(142)
第二节 赋中的“六一风神”——欧阳修辞赋解读	(144)

一 情韵美	(145)
二 结构美	(150)
三 语言美	(153)
第三节 苏轼、黄庭坚赋体散文比较	(157)
一 背景审视	(157)
二 苏轼、黄庭坚赋体散文比较	(161)
三 结语	(169)
第四节 旷达乎? 悲哀乎? ——前后《赤壁赋》 情调差异	(170)
附: 宋人赋论赋话辑录	(176)
主要参考书目	(280)
后记	(283)

第一章 宋代的文化环境与宋代辞赋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章气运，与世推移，“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具体言之，一代文学及文风的形成都是一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多因素影响下的产物，一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等，正如植物生长的土壤、水分、空气，是文学赖以成长的外部环境。一位哲人曾说：“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宋代辞赋文学也不例外。考察宋代的文化环境将有助于准确把握宋代辞赋的审美取向及其特色。

第一节 宋代的文化政策

公元 960 年，后周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率大军回师京城，建立宋朝，于是绵延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唐末五代的动荡政治局面从此结束，中国封建社会又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

由于赵匡胤本身原为一藩镇长官，其夺得天下的方式在历史

上传闻是颇具戏剧性的。出于一种政治权术的敏觉，以赵匡胤为首的宋代统治者在结束五代局面的过程中，着重考虑的根本问题，必然是如何彻底消除藩镇割据的威胁，使宋不再成为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的王朝。从这一根本性的功利考虑，北宋开国之后制定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专制措施，将一切权利收归皇帝一人掌握。抑武将而崇文士，注重文治，便成为宋王朝一项重要国策。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三记载了宋太祖与赵普的一段对话，可视为此项政策的先导：“上问宰相赵普曰：‘儒臣以武干者何人？’普以知彭州、左补阙辛仲甫对，乃徙仲甫为西川兵马都监。”《宋史纪事本末》卷二亦记：“上因谓普曰：‘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在宋太祖眼里，对王朝的威胁不是来自文人，而是来自武将；文人即使作奸犯科，其害远逊于武人，仅仅是秀才造反，数年不成罢了。宋太宗又谆谆告诫天下士人：“尔等各负志业，效官之外，更励精文采，无坠前功也。”（《选举志》卷一五五）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宋朝上上下下重文之风渐起，对促使宋朝成为继唐之后又一个“郁郁乎文哉”的王朝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宋朝任用文官，并重文职，对科举制度实行了重大改革。首先扩大了录取的名额，相比唐代录取的名额扩大了许多倍，“国初进士，尚仍唐旧制，每岁多不过二三十人。太平兴国二年，太宗皇帝，以郡县缺官颇多，放进士几五百人，比旧二十倍”（王栎《燕冀治谋录》卷一）。又仁宗朝十有三举，进士四千五百七十人。其次重文章，不重门第。对士人一律采用只视文章、不论

门第的方法，改变了过去科举中门第、文章并重甚至只重门第的格局，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大批出身于民间“贫寒之家”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出路，使一般中下层乃至平民百姓中的士人能源源不断地补充到朝廷的士大夫队伍中来，一代长期埋头书斋寒窗苦读的士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对此宋太宗曾得意地说：“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再次，科目较多，能各展其才。据《宋史·选举志》记：“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神宗始罢诸科，而分经义、诗赋取士，其后遵行，未之有改。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时取才唯进士、诸科为最广，名卿巨公，皆由此选，而仁宗亦向用之，登上第不数年，辄赫然显贵矣。”这样的改革确实为许多下层人士展示出广阔的政治前景，吸引着广大的士人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政治上经济上的优越地位，而同时，这些士人一旦登上政治舞台，他们除竭诚为王朝政治服务之外，还会利用从政之暇，致力于文学、艺术，从而创造出更为丰富多彩的精神财富。这一改革较之汉代的“察举”、魏晋的“九品中正制”无疑是重大进步，就是相较于唐的科举取士，也大大前进了一大步，因为在唐朝还未完全丢开门第不提。

历数宋代著名的一批宰辅大臣和文人学士，大多出身寒微。范仲淹，“苏州吴县人。……二岁而孤，少有志操，既长，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举进士第。……”（《宋史·范仲淹传》）他是以贫寒之士走上政治仕途的。欧阳修家庭的贫寒，人所共传，“四岁而孤，母郑氏……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而后

却“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后又先后任馆阁校勘、龙图阁直学士、礼部侍郎、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特别是利用自己主持考试之机，大批地奖掖后学，提拔和培养一大批人才，成功完成了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入仕，一举成名天下知，更是北宋年间文坛佳话，三苏身处西蜀边鄙，眉州人氏，进京应考前默默无闻，可是进京后声名鹊起。“当至和、嘉祐间，（洵）与其二子轼、辙，偕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得其所著书二十二篇献诸朝。书既出，而公卿士大夫争传之。……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博辩宏伟，读者悚然想见其人。既见而温温似不能言，及即之，与居愈久而愈可爱，问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无穷。呜呼，可谓纯明笃实之君子也”（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由此可见当时风气所向所取，重文章而不重出身门第，重学问而不看地域偏狭。

又加之此时印刷术的运用，前代典籍得到较为系统的整理出版，文人普遍读书多，善思考，影响宋人的文化修养大大高于前人。

在这样的文化政策下，更多的平民知识分子登上政治舞台。正由于来自下层，他们思想敏锐，能够关心民瘼，情系国事，自觉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亡休戚相关，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较为稳定的从事精神文化产品生产的群体。有宋一代，可以说是文化与政治高度一致的时代，宋代的文官政治使文人从政机会得以充分实现，相应地，文坛主体亦兼具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宋代文人的这一特点影响了宋代诗歌、词、古文的发展，同样也影响了辞赋一体的发展方向和审美特

征。

第二节 宋代特殊的社会矛盾

宋王朝从一开国就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

首先是表面繁荣，实则贫弱。诚然宋王朝的经济也曾一度得到发展，“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祐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同时宋朝的城市经济畸形繁荣，据《东京梦华录序》云：“仆……癸未到京师……正当輶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桦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会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这反映出北宋年间东京的繁荣极盛。就是到南宋朝，朝廷偏安一隅，其杭州城的繁华也不稍减几分。柳永的“参差十万人家”还指的是北宋元丰年间的杭州，但据《梦粱录》记南迁后的杭州繁华依旧：“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杭州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足见杭城繁盛耳。”其他如《武林旧事》、《钱塘梦》等书籍都有类似的记载。然表面的

繁华终究难掩实际上的贫弱，当时的下层民众却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单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雨露降而岁功不登，寒暑迁而年谷无获。富者益以多畜，贫者无能自存”（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二七），下层百姓“谷未登场，帛未下机，已非所有。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绌褐而不完”（司马光语）。可见当时贫富对立已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

其次是外祸不断，朝廷苟安屈辱。“天下之势弱，而历数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确实如此，有宋一代外祸不断，而宋王朝已复汉唐的气魄和实力，始终处于挨打和失败的境地。历数北宋以来与辽、夏、金的莫州之战、涿州之战、三川口之战、定川之战等，无不以失败告终。而战败的结果不是赔款就是割地，神宗熙宁八年“……遣……韩镇……如河东，割新疆与之，凡东西失地七百里，遂为异日兴兵之端”（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二一），澶渊之盟“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辽史圣宗纪五》），绍兴和约“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同前卷七二），嘉定和约“岁增币为三十万，犒军钱三百万贯”（同前卷八三）。如此一来，无疑是雪上加霜，在本来就日渐贫血的肌体上再抽血放血。

再次宋王朝冗兵、冗官、冗费，导致官僚机构的空前庞大和腐败、财政的吃紧。对此前人也多有记载，如宋祁《上三冗三费疏》言“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尽取山泽之利而不能足也”（见《宋史·王禹偁传》）。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云：“庆元二年四月，有朝臣奏对，极言云：曩在乾道间，京朝官三四千员，选人七八千

员。绍熙二年……合四选之数，共三万三千五百十六员，冗倍于国朝全盛之际。……病在膏肓，正使俞跗、扁鹊，持上池良药以救之，亦无及已。”“今又府库匱竭，民鲜盖藏，诛敛科率，殆无虚日，三司计度经费，二十倍于祖宗时”（苏舜钦语）。

凡此可见，当时社会民生凋敝，社会矛盾严重，上层统治者日益腐败，对外面临着的民族的屈辱和失败，这一系列问题是正直的文人士大夫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文学不可避免的主题，当然也是赋体文学关注的主题。

第三节 宋人特殊的文化心态

由于宋朝特殊的国运，造就了宋人特殊的文化心理。由于他们情系国事，关心民瘼，故对宋王朝的前途和命运，都寄予了极大的期望。但耳闻目睹的社会现实，却屡屡令人失望。宋王朝虽然结束了五代的纷争，可是统一的版图大为缩小，不要说汉唐时的故地无法全部收复，就连眼前的地盘都难保全，乃至南宋偏安一隅，抱残守缺，岌岌乎危哉！这不能不给宋人的心理造成莫大的遗憾，带来心中忧虑抑郁的情结。而这种抑郁的情结一旦与禅学老庄的精神融合，便形成宋人的中年心性。宋人犹如一个历经挫折的中年人，虽未完全丧失对未来的期冀，但内心却少了年青人的朝气和热情，多了些沉稳、冷静、恬淡和旷达。其次，宋代文人虽然有了较多的从政机会，但统治者是否能如空言表白的那样，广开言路，广泛地听取文人的直言极谏呢？虽然宋代的文字狱不及明清时代那样残酷，可为官的士人还是时时陷入党派的争斗之中，苏轼的蒙受“乌台诗案”便不是一个偶然的例子。

再者，在有宋一代，士大夫普遍对佛禅之理与老庄哲学抱以极大的兴趣，杨亿、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等都有这方面的故事典故传布人口。据《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九记：“杨文公深达性理，精悟禅观。……丞相王公随亦悟性理……张尚书方平，尤达性理，有人问祖师西来意，张以偈答之，曰：‘自从无始千千劫，万法本来无一法。祖师来意我不知，一夜西风扫黄叶。’可见当时风气之盛。贵为宰相的政治家王安石也不能免俗，《宋人轶事汇编》卷十记：“王荆公一日访蒋山元禅师，谓元曰：‘坐禅实不亏人，余数年欲作胡笳十八拍不成，夜间坐禅已就。’元大笑。”在王安石的生活中，参禅打坐甚过了吟诗作文。苏轼与黄庭坚，更是人们乐道的好禅高手，子瞻被称为“大夫禅”，鲁直被称为“祖师禅”。宋人的这种人生态度，不但影响了创作的思想倾向——宣扬达观的哲学；而且影响了创作的风格——经常呈现出旷达、爽朗的艺术格调。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可谓此种心理和风格的绝妙艺术表现：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也。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

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范文正公集》）

此文，虽题名为“记”，实则赋体，是宋人以赋为文的典型篇章。它以精练传神的笔触，铺叙描绘了洞庭湖阴晴气候变化的不同景色，以及游人触景所生之情，最后表达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襟和人生态度。虽然后人特别推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之心”，可是终究未能脱去宋人的抑郁情结和由此而生的达观、旷达，和超出于低层次欲望的高雅、淡泊。

又如欧阳修的《秋声赋》在秋容、秋色、秋气、秋意的描绘中抒写的仍旧是安分知足、自甘恬淡的感情。东坡前后《赤壁赋》所蕴含的感情，前人称曰：“出入仙佛”、“悠然旷然”、“读此二赋，令人有遗世之想”，也无不表现出宋人特殊的文化心理。庄子的万物齐一、超然物外、听任自然的思想，佛家的与世无争、随缘自适、无挂无碍的教义，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宗旨，在欧阳修、苏轼等文人这里融会贯通了，化为旷达超脱的处世哲学和审美理念。他们欣赏着大自然的山山水水，欣赏着大自然的阴晴变化，政治仕途中的不快或遭贬的矛盾痛苦、“忠而被谤”的委屈都刹那间化为乌有，心理重又实现了平衡。

第四节 宋代辞赋的基本特征

特殊的国运，造就了特殊的文化环境；特殊的文化环境，必然造就特殊的文学风貌。在宋朝特殊的文化背景下，辞赋一体在